

关于文献、逻辑推理以及 指导思想诸问题的商榷

——评李定信《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

范春义

作为术数门类之一，风水文化源远流长，在当今社会更是风起浪涌，其影响远非其他术数门类可比。“郭璞规划思想学术研讨会”^①与“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的召开^②，“风水申遗”^③以及设立“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④就是集中体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来自建筑学界、地理学界、美术理论界的部分学者从实用价值、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山水画论批评等不同角度对风水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值得瞩目的是，来自民间的风水业者也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李定信先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⑤。《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下文简称《堪舆典籍研究》）^⑥的出版，就是作者数十年来辛勤探索的结晶。作为有着六十多年风水实践的业者，作者对于风水流派技术操作极其熟练，在关乎风水的某些重大问题上有着精到阐释。例如，关于旧题郭璞《葬书》之“藏风”概念，他解释为：“所谓藏风，并不是其他风水经典和历代许多术者说的蔽外来‘空气流动而成风’的风。因为这种风是蔽避不了的，更是藏不住的。而这里所说的风，是生气噫而成的风，是生气盈而外溢，或聚气不良而扩散的生气。所以藏风的意思应该是使生气不噫，防止四面八方扩展的生气。即是说扞坟墓要密封，或进葬在较深的地层。阳宅要注意保温和通风设备，使住宅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适合人的生活生产，就称之为藏风。”^⑦正如作者所批评的那样，现在几乎所有的风水实践者，包括在高校讲坛大讲风水实用价值的建筑学、地理学教授们，都把“藏风”当作躲避外面凉风尤其是冬天北风的侵袭，属于十足的望文生义。风水罗盘作为风水业者的必要装备，确实充满玄机，其内容外人很难读懂，该书的解释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罗盘上的内容，为深入研究罗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但是，《堪舆典籍研究》还有不少问题，存在于具体技术操作和指导思想两个层面。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堪舆典籍研究》的效果与作者“正本清源”的目的之间存在相当距离。关于风水的评价定性，问题更为复杂，本文暂不涉及。笔者将重点讨论文献方面的问题。如果风水文献问题搞不清楚，风水的所有相关文化研究必然是一摊糨糊。而在风水文献当中，具有坐标原点性质的是《宅经》与《葬书》，《宅经》是阳宅风水的代表性作品，《葬书》是阴宅风水的代表性作品。笔者主要以这两部书来加以说明，借机向李定信先生与风水研究同行请教，以期通过本



文的探讨,促进风水及其相关研究早日走上学术正轨,令我们更加理性地对待源远流长的风水文化。

《堪舆典籍研究》在文献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未能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辨伪意识不强,依据的材料并不可靠;三是不能充分把握风水文献的成书特征。此外,在逻辑推理与指导思想上也存在可商榷之处,每一方面的欠缺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

尊重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学术研究水平上升的必要条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于正确的观点要加以吸收,二是对不合理的观点要加以检讨。《堪舆典籍研究》在这方面存在着缺陷,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导致了在一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又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以《宅经》为例,四库馆臣早已对《黄帝宅经》的源流、作者、内容以及成书时间进行了中肯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李定信先生在对《宅经》的《考评》中说:“本书作者是谁,无法考证。很可能是明清时代的人,其成书则在明代以后。又根据其中有《三元宅经》,因而不会早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应该在蒋大鸿(1620—?)以后到清初这一段时期。”(61页)“由一监生所撰。”(430页)实际情况如何呢?在敦煌卷子中,就已经出土了《黄帝宅经》,即P3865号,与《四库全书》版《宅经》内容大致相同,只是不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卷子下限通常认为乃公元1002年,《宅经》在此之前显然已经问世。因此《宅经》的成书年代无论如何也不能拖到明末清初。而作者提到并进行考察的《三元宅经》,除了在《宅经》中有引用外,《宋史·艺文志》已著录为三卷。该书在唐宋时期影响较大,敦煌卷子P2615a亦引其内容^⑥。敦煌卷子P2615a又引有《三元经》,与《三元宅经》可能是同一著作。作者由于对敦煌文献缺乏必要了解,未能见到《三元宅经》的更早版本,所以他的推论也就失去了依据。

再如关于《宅经》中的一些技术性知识,李定信先生说:“全书术语大部为自造,例如命座、帝车、帝辂、帝车杀父、帝辂杀母等,不胜枚举。”(61页)其实这些术语绝非自造,而是渊源有自,并且已经被研究者揭示得清清楚楚。冯静指出,《宅经》中记载:“凡欲修造动治,须避四王神,亦名帝车、帝辂、帝舍。假如春三月,东方为青帝,木王,寅为车,卯为辂,辰为舍,即是正月二月三月不得东户。经曰:‘犯帝车杀父,犯帝辂杀母,犯帝舍杀子孙。夏及秋冬三个月仿此为忌。’”^⑦《睡虎地秦简日书·蚩》记载:“春三月,蚩为室申,剽卯,杀辰,四废庚辛。夏三月,蚩为室寅,剽午,杀未,四废壬癸。秋三月,蚩为室巳,剽酉,杀戌,四废甲乙。东三月,蚩为室辰,剽子,杀丑,四废丙丁。春三月,毋起东乡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室。秋三月,毋起西乡室。冬三月,毋起北乡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冯静通过比较,指出二者小有差别,但是属于“同样思想体系的经文”。另外,关于《黄帝宅经》之“五实”、“五虚”,在秦简《相宅篇》中也有类似内容^⑧。对于《黄帝宅经》,赵健雄《宅经校译》、冯静《黄帝宅经考》、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于视野限制,李定信先生对《宅经》研究现状了解不足,不仅未能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反而增加了新的混乱。

是书对于已知的前人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吸收,未能构成对话关系。作者在自序中说:“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文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迷信。而对《四库全书》,因其是皇帝御笔亲点的,更不敢究其真伪了。”(自序,第4页)这一判断毫无事实依据。早在《四库全书》编纂时,四库馆臣就对收录的风水典籍进行了学术水准极高的评价和梳理。在子部术数类的小序中指出:

“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明确指明此类术数书籍通常具有假托的特征。在具体的风水文献中,四库馆臣同样进行了具体的考证,例如关于《撼龙经》,《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曰:“旧本题唐杨筠松撰。筠松不见于史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但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袁州人,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无稽之谈,盖不足信也。”^⑩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编成后,后人又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于风水典籍的研究功力颇深,而其第一要义就是“辨伪”。况且李定信先生自己也运用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成果,所以“不敢究其伪之说”不知是对何而言。再者,在关键问题上绕开前人的质疑。比如关于《葬书》,四库馆臣通过考证,事实上不承认郭璞作《葬书》说^⑪。嗣后,清人丁芮朴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证,提出了《葬书》非郭璞所撰的九条明确理由^⑫。今人王青、王玉德等学者续有驳议(李定信先生已经注意此二书)。《葬书》是作者信奉的看家宝典,论证其真实性无论对其自身的风水操作还是风水史的学术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而要研究郭璞作《葬书》的真实性,必须要对以上诸位的质疑作出合理解释,然后再举证正面材料加以论证,这才是正常的学术研究程序。作者置以上诸人有力的质疑于不顾,另起炉灶论证郭璞对《葬书》的著作权,即使理由充足,说服力也要大打折扣。

二

文献方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辨伪意识不强,采用了大量不可靠的资料。

首先来看李定信先生研究《葬书》所运用的资料。作者认为自己掌握了古本,能够恢复《葬经》的原貌。据作者介绍,他收录了经术士粉饰的二十篇本、蔡元定的八篇本、吴澄的三篇本,以及《古今图书集成》、《地理大全辑要》、《地理直指原真》等多种版本。“长篇的、二十篇的、八篇的和三篇的,其核心内容都是在二千六百多字内打转转,并没有增加多少或删除多少。特别是长篇和二十篇的,几乎完全相同。”(243页)“蔡元定的八篇本较之二十篇本,被删者仅二十三句,九十一一个字。而且被删去的也并非全为‘芜杂’。”(191页)据笔者考察,李定信先生掌握的古本绝非宋代原本。作者收藏本未公开披露,故未曾寓目。但是,从他透露的信息来看,有许多疑点。第一,通行本《葬书》一共分三篇,二千六百多字。如果与二十篇本内容大致相同,平均而言,二十篇本每篇应该在八十字左右。而作者收藏的八篇本,比二十篇本少“仅仅是九十一一个字”,平均每篇不到八个字,一般情况下,大致等于普通一句话的长度。从篇幅来说,殊悖常理。第二,关于添加内容:“特别错误的是增加了‘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谬论。”(191页)根据《〈葬书〉叙》记载,蔡元定只是“删除”而未“添加”。即使是有所“添加”,“添加”的内容也不正确。因为蔡元定在《发微论》中,上述内容明确表述为:“《经》曰:“气乘风散,脉遇水止。””^⑬可见添加之说不能成立。第三,“《葬书》李本芳传本载:杨筠松著有《青囊奥语》、《玉尺经》、《天玉经》。曾文辿著有《天玉经序》。”(246页)这一谱系完全是后起的记录与总结。根据现有材料,在宋代并没有发现这一谱系的可靠记载。第四,元代吴澄《〈葬书〉序录》明确指出:“《葬书》相传以为晋郭璞景纯之作,内外八篇,凡一千一百五十八字。”^⑭字数与作者所言“二千六百字”相差四百余字。可见,李定信先生之二十篇本、八篇本绝非蔡元定所删减之二十篇本和剩余八篇本。它们同样是经过后人修改加工的本子,也就不能作为推定今本《葬书》原貌的依据。再补充一坚实证据,关于“占山之法”条“占山之法,以势为难,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势如流水,生人皆鬼”一段,作者在复原本中把该段排在了杂篇之首,也就是说,这一做法是综合了各

种善本得出的原貌。其实这一小节原本不在此位置,元人赵汭《葬书问对》明确指出:“近世临川吴公刊定其书,致是语于杂篇之首。”^⑩可见该条内容本来不在此位置。作者依据的古本并不可靠,在此基础上对《葬书》的复原也就只能是“复而不原”。

在引用材料方面,李定信先生对于史料缺乏必要的鉴别意识。如果引用书籍本身不是伪书,但是记载的内容却不真实,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自然是沙上建塔。例如关于《青乌子》,作者引唐代王瓘《轩辕本纪》曰:“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关于《轩辕本纪》之类书籍不能作为严格的史料来用。其实有关青乌子最早的记录,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青乌子善术数。”再比如作者考察古代的风水著作,以明代徐善继撰《地理人子须知》著录的作品为标准,实则《地理人子须知》取材比较随意,不足为据。

关于杨筠松的一条关键材料,康熙《零都县志》卷一〇有简单介绍:“杨筠松,窦州人。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过虔州。以地理术授曾文迪、刘江东。世称为救贫仙人,卒于邑之药口,遂葬其地焉。”^⑪对于《江西通志》^⑫的说法,四库馆臣认为是“无稽之谈,盖不足尽信”。这个评价比较中肯。笔者以为个中理由有三:第一,资料来历不明,真假难辨,难以据信。第二,逃难方向与史实不符,长安攻陷,应该往东南逃窜,而不应该折向西北。第三,官职与规制不符,掌灵台地理事最高级别为从五品,不应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元代吴澄对此也曾提出过怀疑:“长安苍黄出奔时,跋涉万里,九死一生,仅保余息,恶有文自随?”^⑬可见,这条材料本身尚需论证,不能直接拿来作为证据使用。

在“溯源求根”中,作者认为“只有根据《葬书》本身来追根溯源”。其实,这正犯了风水文献研究的大忌。对于术数类典籍包括道教典籍,不能完全以其自身的记录来证明自身的可靠,原因就在于术家多假托附会之词,严谨的学者必须从外界寻找材料,在风水书籍自身记载范围内打转,问题永远搞不清楚。《堪輿典籍研究》不加辨别地使用风水典籍中的材料作为立论基础,使很多问题的探讨失掉了根基,得出的结论难以成立,也直接降低了本书的价值。

三

本书在文献方面存在的第三个问题,表现在对于风水典籍的文献特征不熟悉,导致了对于《葬书》内容的误读。不同的风水技术有不同的来源,汇编为一处的风水典籍具有明显的“杂抄”特征。这些杂抄的内容往往互不关联,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往往显得方枘圆凿。实事求是的处理,应按照其来源进行解释。例如《葬书》中,其内容来源至少包括四个系统:一是形势系统;二是“龙耳”系统;三是“八葬”系统;四是过程系统。这四个系统都有各自的渊源。例如,“势”实际强调的是大范围内山脉的分布形势。“形”系统规定不同地形带来不同命运。按照特定地势、地形进行吉凶判断由来已久,取象的对象一般为常见的物品,包括动物、衣服、工具等等。例如S5645《司马头陀地脉诀》载:“夫以山势肥满,吐气宽舒,势似奔牛,多饶杂力。”“无山平地有陇,即是金龟之地。若高圆似盖,名为积笏之罡。”^⑭在《地理新书》中,类似内容更多,并且以附图的形式出现^⑮。只不过到《葬书》中两个因素已经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龙耳系统是一种独立的地形吉凶判断体系,与《葬书》的理论与其他地形选择技术没有关系,纯粹是汇编过程中产生的内容。《葬书》引《经》曰:“势止形昂,前涧后冈,龙首之藏。鼻颡吉昌,角目灭亡,耳致侯王,唇死兵伤。宛而中蓄,谓之龙腹,其脐深曲,必后世福。伤其胸胁,朝穴暮哭。”这完全是按照“龙耳”系统的标准进行判断。《四库》本《葬书》的解释者却按照自己理解进行了错误

的解释。例如：“鼻颧吉昌，角目灭亡，耳致侯王，唇死兵伤。”就解释为：“此以龙首为喻而取穴，非谓真有鼻、颧、角、目也。但鼻、颧以喻中正，故吉，角、目偏斜而又犄硬孤露不受穴，故凶。耳言深曲，唇言浅薄，所以有侯王兵伤之别。”^②李定信先生坚信上述解释，认为：“千百年来，绝大部分作者都把首、鼻、颧、角、目、耳等释为龙首、龙鼻、龙额、龙角、龙目和龙耳。《晋书·郭璞传》也把《葬书》的耳、角释为龙耳和龙角。”(231页)他认为：“一，《葬书》的主题是说乘生气，葬在龙鼻、龙额、龙耳吉昌，如何像形于生气的旺盛而主吉昌呢？葬在龙角、龙目、龙唇又如何能像形于生气的不旺盛或没有生气而主凶祸呢？既然提了龙唇、龙耳等，为什么不提龙齿、龙眉、龙腮或龙颊、龙脚、龙翅和龙尾呢？特别是说‘龙腹’，是不可能有的。只能释为生气旺盛形如龙腹凸起来，或如其脐深凹下去……二，作为能撰《葬书》的郭璞，绝对不会撰写出开头就是乘生气，而结尾竟是龙头、龙鼻子和龙耳，这样首尾不相顾而牛头不对马嘴的文章来。”(231—232页)作者之所以提出这些疑问，原因在于《葬书》是汇编而成而非郭璞所写，“龙耳”系统压根就与“乘生气”无关。其实龙耳系统择地方式起源甚早，东晋就已有此术，见《晋书·郭璞传》之相关记载。类似记载还见于敦煌卷子S5645《司马头陀地脉诀》：“凡山罡形势，高处为尾，傍支长者，近为头，实者为角，曲外为背，内为腹内匈（胸），中出为脊背者，为乳足。”^③《地理新书》的解释更为详备：“凡山冈高处为首，下处为尾，傍枝为足。龙之形势，各有所宜，番（笔者注：似当为审）而观之矣。所用之地当龙角，主病狂。龙背主淫乱及有暴刑。龙耳、龙腋，吉。龙首主贫，龙齿主暴死者。龙额，富贵而不能长久，又出吊死者。龙吭大凶。龙足主客死者。龙乳、腹主富贵。龙尾不利后嗣。”^④从这些解释看，这一系统是针对孤立的山脉选择而言的，与讲究四灵配合的葬地选择法迥异。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龙耳系统还有可能是一种方位系统的选择办法，就是按照不同方位给予不同的上述称呼。《黄帝宅经》“阴宅图”中，亥位为龙尾，子位为龙左足，卯位为龙左肋，辰位为青龙左手，巳位为龙头，午位为龙右手，申位为龙背，酉位为龙右肋，戌位为龙右足^⑤。可见，这种方法是把一条山脉分成不同的地点，根据所葬的具体部位进行吉凶判断，与《葬书》的“生气”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不少风水研究者包括李定信先生误解这一条内容，主要是因为视《葬书》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忽视了其“汇编”的特点。

四

除了上述文献问题，在逻辑推理上，《堪舆典籍研究》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上文指出，作者没有回应关于《葬书》的质疑，这就决定了必然另起炉灶。他首先论证“《葬书》不是一部简单的经典，它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性不亚于《周易》。”(244页)“撰写《葬书》的人，首先就要具备丰富的风水实践经验，从《葬书》的叙文和用字（古字）方面看来，还必需具备高深的古文修养。”(245页)其实这一前提本身就有问题，且不说《周易》与《葬书》孰高孰下，关于《葬书》是编写还是著作就存在问题。如果是编写，李定信先生的前提就不存在。况且《葬书》语言非常普通，为普通的散韵结合体，个别段落具有赋的意味，并不需要“高深的古文修养”。

作者从《晋书·郭璞传》入手分析，“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视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作者认为“其中的龙角、龙耳，不是出之于《葬书》，也是出之于《葬书》以前的《青囊经》、《狐首经》或《青乌经》。”(243—244页)其实到目前为止，《青囊经》、《狐首经》或《青乌经》仅见于宋代以后材料。此前是否存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作者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名流列传附录》：“张燕公，唐代，曾为《葬书》作注。”(245页)说明唐代已有了

《葬书》而未列入唐志。《古今图书集成·名流列传附录》的资料来自后起的风水典籍,并不可信。在此事实不确定的情况下,作者接着根据《南安府志》论证在唐代的流传,断定杨筠松之“禁中玉函秘术”就是郭璞《葬书》。且不说《南安府志》为后来资料,即使可靠,也没有提供《葬书》的任何信息。可见,作者的结论从基本前提到流传都是建立在假设之上。

此后,作者运用排除法进行论证。这里同样存在着严重逻辑问题。因为通过排除法来论证郭璞撰写《葬书》,必须满足如下条件:《葬书》一定是在郭璞时代写成的,撰写者候选人具有封闭性。事实上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首先李定信先生依据《地理人子须知》、《古今图书集成·名流列传附录》录入唐代术士名单,然后根据他所了解的每人的风水专长,逐一排除与《葬书》的关系。此处引用的资料本身就真伪难辨,把引用的风水术士当作唐代的风水术士全部则显然不确。根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在唐代或唐前有名有姓的风水术士及其著作至少有如下五种:1.《玄女弹五音相冢经》一卷,胡君撰;2.《新撰阴阳书》三十卷,王粲撰;3.《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4.由吾公裕《葬经》三卷;5.孙季邕《葬范》三卷。《堪輿典籍研究》在排除隋代、南北朝、东晋的术士时,都运用了这一办法。认为“晋代有可能撰写《葬书》者,仅郭璞、陶侃、韩友三人”。其实至少郭璞的老师河东郭公也应该在考虑之列。因此只能强行得出结论:“自东晋至唐末,能够撰写《葬书》的风水家,除郭璞外,别无他人,可以肯定《葬书》是郭璞所撰。”(249页)

这一办法首先假定有郭璞作《葬书》的事实,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杨筠松的“窃书”、张燕公的“注书”提供了貌似可信的证据,然后用排除法进行鉴定,而前提正是要确认的对象,构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留下了很多漏洞,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据信。

另外,《堪輿典籍研究》中还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在文献方面,关于《四库全书》术数类书籍的来源,作者写道:“《四库全书》中的术数类是辑自《永乐大典》的资料。”(429页)其实只要读读《四库全书总目》,就会发现术数类的书籍来源在书名后面标得清清楚楚,是否出自《永乐大典》一看就知。关于风水文献的传播,作者认为:“那么,《葬书》为什么自宋始出呢?很简单,这种能出皇帝的宝书,岂能流传于民间?”(249页)其实,强调术数来源之神秘正是术家自神其教的惯用手段。在官方视野中,最可怕的是谶纬、太乙、天文类的书籍,风水书籍是最不值得禁止的术数书籍。而且政府一再组织人力编写,颁布执行。例如东汉编纂《大衍衍基》,唐代吕才整饬风水书籍,宋代王洙编纂《地理新书》都属此类。尤其宋代曾经发布数道禁书令,风水都不在禁止之列。例如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下诏:“两京、诸道,阴阳、卜筮人等,向令传送至阙,询其所习,皆懵昧无所取。盖矫言祸福,诳耀流俗以取资耳。自今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限诏到一月送官。”^⑤此诏书限制范围很大,但是二宅不在禁列。在风水知识方面,李定信先生对非本门的风水知识也缺乏充分了解。例如评论《宅经》:“毫无风水的气味。全书所述,都是日家的修方。”(61页)在中国风水史上,日家修方是阳宅风水的重要内容,从秦简到敦煌卷子的相关记载,再到《地理新书》,内容丰富,线索清楚。再比如个别字错误,元代“赵沔”打印为“赵访”(242页)。以上探讨仅举有代表性者,可见《堪輿典籍研究》存在问题之一斑。

五

以上是在技术层面存在的问题。在指导思想,《堪輿典籍研究》的研究目的与学术界研究的目的也距离甚远。学术研究,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避免先入为主。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对

象,可以有所偏好,但在学术定位上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对于风水研究而言,我们所做的首先就是客观展示风水发展的原貌,这是基础。然后再对其影响、价值进行评价。由于风水作为一种术数技术在实践中一直发挥作用,而其理论基础有别于今天的科学观念,所以在今天,我们若要应用风水,先得探讨风水的运用的可能性及其方式。否则,把风水称之为最先进的科学必定会招致强烈的质疑,被批为“挂着羊头卖狗肉”也自在情理之中。而作者“试图揭示出中国古代风水的本来面貌”“我们要对风水拨乱反正,使风水去江湖化,就势必要对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风水古籍进行一次审阅,从源头上将风水的江湖化现象扭转过来。这就是我撰写《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的根本动机。”(《自序》第4页)事实上,作者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郭、杨风水的惟一合法性与正宗性,这在本质上与其他风水业者宣扬各派主张并无二致^⑦。

由于受上述观念影响,作者运用的某些概念也与学界的认识颇不相同。例如,关于伪书,学术界认为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而李定信先生认为:所谓风水伪书是指非郭、杨风水派别的书。不加说明地使用自创概念,必然带来探讨所指对象的偏离。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任何人都有研究的权利和自由。既然是学术研究,那就应该讲究一些基本的规范,需要一些共同的前提。没有共同的规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风水研究也就不可能走向规范。同时,一部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的书能够以学术著作身份在权威出版机构出版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这正是撰写本文的用意所在。

- ① 由温州市政府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主办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第六次年会暨温州古城建城1680周年郭璞规划思想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17日在温州开幕。详情参见刘华卓《东瓯古城,已沐千年风霜——专家学者聚温研讨郭璞规划思想》,2003年11月18日《温州日报》第1版。
- ② 2004年9月9日,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召开。这次大会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办,有国内外研究建筑风水文化的专家、学者300多人参加,详情参见<http://house.sina.com.cn> 2004年09月13日17:02新浪房产。
- ③ 张志哲:《关于中国风水遗产》,为在北京大学演讲题目,来源:<http://www.soufun.com> 房地产门户—搜房网 2007年10月9日11:17。另 2006年12月14日,上海生活美学学会提出将“风水”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争议。该学会会长张良仁提出,倡导“天人合一”等内容的风水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当之无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见《上海都市报》,2007年12月15日。
- ④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笔者注:后者系主办者私人行为,未得到南京大学授权)举办“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详见亦心《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引发激辩》,载《中华建设》,2005年第7期。
- ⑤ 据李定信先生本人介绍:“李定信,1922年生于江西赣州,193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工科,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专门从事客家杨益文化的研究和实践达半个多世纪,现为中国赣州杨益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赣州杨筠松文化研究会总顾问。撰写了《中国罗盘49层详解》等多部著作。”见《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扉页。
- ⑥ 《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该书是由风水业者在权威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第一部大部头的风水研究著作,与普通的风水技术介绍不同。据曾祥裕先生介绍,《堪舆典籍研究》的出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慧眼识珠的结果。该书出版后,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赣州日报》发表新闻消息,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详细情况参看曾祥裕撰《〈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发行仪式在赣州举行》,(来源:<http://www.chinavalue.net/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33003> 2008年10月30日)《堪舆典籍研究》不仅代表了李定信先生的个人观点,从参予出版的人员来看,至少还代表了部分地理界(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李宝田指导)、建筑界(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程建军参与核对)、文物界(深圳市南山天后博物馆馆长龙辉参与核对)部分专家的观点。(详细介绍见《堪舆典籍研究》前言,第5页。)鉴于该书的研究著作性质,有必要从学术层面加以探讨。
- ⑦ 李定信:《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第200页。下文凡引本书,随文括标页码。
- ⑧②③ 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第322页,第323页。
- ⑨⑤ 《宅经》,《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第9页。

- ⑩ 冯静：《黄帝宅经考》，浙江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10页。
- ⑪⑫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31页，第1430—1431页。
- ⑬ 丁芮朴：《风水祛惑》，《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版，第51—52页。
- ⑭ 蔡元定：《发微论·感应篇》，《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本，第193页。
- ⑮⑯ 吴澄：《吴文正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第21页，卷一六第174页。
- ⑰ 赵金声：《地理正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 ⑱ 卢振先等撰修《零都县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4页。
- ⑲ 此条材料《零都县志》、《南安府志》、《江西通志》记载大致相同，文字略有出入。李定信先生依据的是《南安府志》，四库馆臣依据的是《江西通志》。
- ⑳㉑ 王洙等：《重校订地理新书》，《续修四库术数类丛书》本，第28—33页，第25页。
- ㉒ 《葬书》，《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本，第27页。
- ㉓ 李焘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 ㉔ 由于受这种主观思想的影响，导致了《堪輿典籍研究》在研究中一些正确方法运用的飘移不定。前文已经表明，李定信先生普遍缺乏辨伪意识这是事实，但是他有时也运用辨伪技术，就是在自己主张的思想受到文献资料的排斥时。例如在“杨筠松名号考”，就根据史传是否著录、接受九天玄女天文地理之术过于荒唐、所用技术是否符合本派技术，对《曾氏族谱·杨公先师传略》进行了辨伪，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但对于自己所信奉技术的不利证据却忽略过去。再比如，李定信对于《葬书》记录的风水技术的不统一有所警惕，例如他在谈论“八卦葬”时，就已经意识到内容的不协调。所以认为是后人增益所为。这一问题的性质与“龙耳”系统完全相同。但是可能看到《晋书》有关于“龙耳”系统的叙述，就对《葬书》委曲回护，以致与正确的解释擦肩而过。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责任编辑 山木